

民国电影专史丛书 余 纪 主编

陪都电影专史研究

严 彦 熊学莉 等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西南大学电影学书系

FILM

陪都电影专史研究

严彦 熊学莉 张馨艺 王晓倩 苏韶红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都电影专史研究/严彦,熊学莉等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2

(民国电影专史丛书/余纪主编)

ISBN 978-7-81127-388-5

I. 陪… II. ①严…②熊… III. 电影史—研究—
重庆市—民国
IV. 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039 号

陪都电影专史研究

作 者 严 彦 熊学莉 等

策 划 欣 雯

责任编辑 赵丽华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制作 大鹏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话: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81127-388-5/J·388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历史即财富

——主编的话

余纪

人们常将历史比作遗产，而所谓遗产，就是前人创造出来并留给后人的财富，由此推论，我们就有理由将历史视同为财富，既然是财富，任何理性的人都没有轻视和丢弃它的道理。所以，有关历史的学问从古至今都是学术领域的大宗，中国的电影学术研究同样概莫能外。

中国电影史学和其他大多数专门史学门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仅起于 20 世纪的初叶。而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之一，因了这危及民族存亡的剧烈动荡，导致中国电影事业也在 1949 年前不到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经历了数次创作与产业中心的转移。由此，就导致了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材料散落于华夏大地的多处地方。不把这些散落的史料发掘整理出来，就不能完成中国电影发展过程的完整叙述。

当今国人，大多不知道重庆市北郊的嘉陵江边有一座名叫北碚的小镇；不知道这个历史并不悠长，却又极具历史意味的小镇，因为一位名叫卢作孚的社会改革家悲壮而艰辛的社会改革实验，而在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扮演过很不平凡的角色；更不知道这座青山环抱、碧水曲绕、玲珑剔透的小镇上有一家北碚图书馆，这家不大的图书馆竟然收藏了比全国任何一家图书馆都齐全的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章杂志。大量的历史文献保存了 20 世纪初期大量的历史信息，读懂中国，离不开这些历史信息。

西南大学就坐落在北碚,距北碚图书馆仅一箭之遥。北碚图书馆为西南大学广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正是依托这一条件,西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学科于上世纪末期,启动了因种种原因尘封多年而又不该被遮掩和丢弃的中国电影史上某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比如,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过程的研究、早期中国教育电影发展过程的研究、抗战时期陪都电影产业运作各个侧面的研究等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小的丛书,就是这一研究工作近十年来的部分阶段性成果。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史学科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禁区,不能研究,更不能言说。殊不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某种意志的安排,它只能依循历史自身的逻辑,该存在的就存在过,该发生的就发生了,而不会顾及后世的人们是喜欢还是厌恶,由此,才形成环环相扣的历史发展链条。历史学就是对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原貌,致使其不得不发生的历史动因,以及其所导致的种种历史后果等等,做出梳理、叙述和说明,使之最终成为后世人们的“资治通鉴”。如果从相反的角度去认识和要求历史学,将历史当做可以随意取舍的自选货架,那么,由此产生的后果就必然是我们精神世界的营养不良。先贤早就告诫过,历史不是随意打扮的姑娘。敬畏历史、善待历史,历史老人就会赐予我们智慧和力量,反之,历史老人就会对我们施加无情的惩罚。这个道理,我们已经深深地领教过了。

同20世纪全球所有大国一样,电影是一个覆盖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宏大文化现象,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其本身既是上述一切交互作用和博弈的复杂产物,又是构成这一进程五色斑斓的浓墨重彩,可以说,没有电影史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将是不完全和不科学的历史叙述。然而,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电影发展这一宏大文化现象的叙述和把握,却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粗疏的层面上,大量重要的历史细节还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从而导致我们对电影史上的诸多历史事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电影史叙述的链条时常发生断裂。

《民国电影专史丛书》充分利用北碚图书馆收藏的历史资料,或钩沉、或探微,

意在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发生在电影领域内的种种前人所未发的史实,予以爬梳和整理,以期达到对历史叙述补缺接断的目的。

二

高等教育发展之快,的确是出人意料。十多年前还是稀缺资源的硕士生、博士生,到如今已经多得如过江之鲫。人才多自然是好事,可是多过了头,却又未必让人省心,别的不说,单是每人三年后必须完成的那篇学位论文的选题,就让人伤透脑筋。曾经为外校审读学位论文,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同时收到不同学校送来的论文,却选了相似甚至相同的题目,仅以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为题的硕士论文,我就看过不下三篇,而且结构都基本一样,不外开篇就是生平简介,接着是作品分析,然后草草地缀上一个结论。单以这相同的结构而论,哪能指望它能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岂能不“千部一腔”?从行文不难看出,作者恐怕甚至连平假名、片假名也未必认得全,对日本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了解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似这般隔山打虎,却连虎毛都没摸着,不过一场纯粹的学术表演罢了。这样的学位论文做得再多,又有何益?只怕是空耗了纳税人的血汗和学生的青春吧。

1999年初秋,杨燕和彭骄雪二人开始在我这里攻读硕士学位。那时,我已经预感到两年后她们的硕士论文开题时,将会面临无题可选的困境,所以,刚进校不久,我就向她们提出论文选题的问题。我说,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好走,但没风景可看;一条崎岖,但有无限风光。她们都愿意选择后者。于是,我就把她们带到北碚图书馆。我说,从现在起你们就一头钻进去,三年以后,你们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某一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两年以后,当她们向我报告各自的论文选题时,看着她们整理出来的十多万字的历史资料,我已经无以置喙了。

其间,她们不但确定了各自的研究方向,而且发现,要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仅靠北碚图书馆的史料还远远不够,于是,又钻进了重庆图书馆、重庆档案馆,甚至远赴上海、南京。为了抄档案,2001年暑假期间,杨燕甚至动员现役军官的丈夫小徐,和自己一起在南京泡了整整一个月。我在这里用了一个“泡”字,自以为用得传神,因为,当时南京档案馆没有空调,坐在查阅室里翻找和抄写故纸,人可就真的是泡

在汗水之中了。

因为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字数为3万至5万,所以,两人三年中收集整理的史料,在她们的学位论文中都只用上了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当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教授来主持论文答辩的时候,依然给了很高的评价,同时鼓励她们,毕业后不要放弃,继续做下去,做成了,就为中国电影史的叙述填补了两块空白。

如今六年过去了,她们把硕士论文扩展成了两部书稿:一部是杨燕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一部是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杨燕毕业后在重庆师范大学影像工程系任教,同时还在重庆电视台担任重要职务。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还能完成书稿,其付出的艰辛,应不难想见。彭骄雪毕业后直接考入南京大学,师从周安华教授继续深造,200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任职于浙江传媒学院,又逢得一江南才俊。虽然未曾谋面,都说是郎才女貌,绝配佳偶。耳听一段佳话才破了题儿,惜乎结婚刚满一年,就查出患了癌症,于2007年夏天,走完了她30个春秋的花样年华。书的定稿是她在辞世前的几个月通过e-mail发给我的,当时她已经不能下床。电话里,她礼貌地打断我那些空洞的安慰,说,老师要是能帮我让这部书与读者见面,我也就没白做一回老师的学生,也没有白来人间走了一回……如今,这位美丽的成都女子用她的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完成的作品,终于得以摆上书市的货架,为有心的读者打开一扇窗户,去观览那一片鲜为人知的风景,作为师长,我也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

三

《陪都电影专史研究》是在五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分别是严彦的《抗日战争中内迁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图考》、熊学莉的《陪都时期的电影宣传》、张馨艺的《非常时期(1941—1944年)电影检查所》、王晓倩的《好莱坞电影的陪都市场》、苏韶红的《〈中国电影〉(1941/1—3)研究》。五篇论文从五个不同的侧面,对陪都时期电影的运行给予了描述。除了严彦和张馨艺之外,其余三篇同样也是拜了北碚图书馆丰富馆藏所赐。如今想来,将一班花季少女赶进故纸堆,一年多的时间里,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从几十年前的社会新闻中翻找与电影业有关的零星

消息,再把这些消息提炼成一个个专题,连缀起来,向今天的读者展示那个遥远年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面向,实在是一个残酷的决定。

任何中国电影通史的叙述都绕不开国民政府官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这家制片单位战前在南京,默默无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迁到武汉,还没来得及立足,又匆匆迁到陪都重庆。由于战前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生产设备大多集中在上海虹口、闸北一带,而日军“八·一三”进攻上海时,正是从这一方向发动炮轰的。于是,当时中国本来就羸弱的电影工业基础,在战争初期就被摧毁殆尽,一时根本不可能恢复元气。当时的情势,敌强我弱,要想抵抗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就必须动员起四万万同胞的民族精神,一齐发出最后的吼声,可是,在那个文盲人口超过90%,交通、通信、广播极不发达的时代,靠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动员呢?只有电影,只有电影是最有效的民众动员工具。中国电影制片厂这家仅存的制片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台。其在抗战前期出品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至少在国统区的战争动员中,是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仅基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忽略和忘却它。

然而这家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过战功的制片单位在哪里?在那段常有数十架敌机飞临头顶,扔下百十吨炸弹的烽火岁月里,艺术家们是如何屏住呼吸,心无旁骛,完成那些堪称民族经典的作品?每当问题深入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今天的人们往往就茫然而不知怎样作答了。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承载着无数宝贵历史信息的现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早已退在了历史的纵深的边缘,即将成为永久的谜团。

2003年的深秋,硕士生严彦同学来和我讨论学位论文开题的事。我建议她还是走杨燕、彭骄雪两位师姐的路,做陪都电影这个范畴的文章。早前一点,我听郑洞天老师说,以侯孝贤为首的台湾电影学者在做“口述中国电影史”,这个消息让我大为震动,让我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我知道,重庆市内目前还有少量当年陪都电影的见证人尚在人世,只是都风烛残年,如果不抓紧时间从他们的口中抢救,那许多历史的细节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建议严彦做一点与“口述”有关的东西。

不久,严彦告诉我,她见到了两位老人,一位名叫万声,年届 89 岁;一位名叫陈兰荪,年届 84 岁。两位老人都曾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过,万声任布景师,陈兰荪任业务科宣传员。他们都在青春年少时因战乱从沿海来到重庆,却未因战争结束而离开。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重庆的六十多年里,他们亲眼目睹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步步变化直至踪影全无。毫无疑问,他们的记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得知这一消息,我随严彦同学前往拜望了万老先生,希望万老先生的回忆,能向我们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可惜万老先生老迈年高,加之生性讷于言谈,实在回忆不起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来,可是,由于其年轻时在上海美专受过扎实的美术训练,他的形象记忆力异常惊人,说起当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地貌形制来如数家珍:大门开在哪个方向、办公楼有几层多少间房、办公楼前的咖啡座平时摆放了几张桌椅、片库离办公楼有多远、到职工宿舍要上多少级台阶,甚至连摄影棚的长宽高尺寸几许等等,都能回忆得起来!考虑到严彦本科学的是历史,有过考古学的训练,我对严彦说,你就来做第一篇中国电影史的考古学论文吧。

为了完成这次考古,严彦还寻访了多位九十岁上下的老人,收集到了无数珍贵的言谈和图片。论文完成后,我们曾经萌发过一个想法——做一座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沙盘,或者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内外全景复原在电脑上。可惜因为没有经费,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但不管怎样,这篇论文抢救了一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几近忘却而又不该忘却的历史记忆,为后人保存了一块珍贵的历史场景,其学术价值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四

余生也晚,前半辈子务农做工,劳动了筋骨,空乏了体肤,却又没能养出个好的心性;过了而立之年,才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充其量算是半路出家,所以,近三十年过去,依旧一事无成。虽说是一事无成,却也累积了不少的感想。

一个突出的感想是,在一切史学研究领域,包括电影史,老守着前人几十年前发掘的那些陈旧材料,自己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指望借助洋人发明的新型理论工具,靠着自己聪明的脑袋灵机一动,就能提出某种惊世骇俗的观点,并让这种观

点成为指点江山的真理,为天下人所折服,这大约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梦想。史学是科学,不是梦呓。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就一定是史学研究中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工作,这是史学大厦的基座。没有坚实的基座,无论多么华丽的建筑都应该归入豆腐渣工程一类,迟早是会坍塌的。我不赞成在史学研究中划分三六九等,更不认为提出观点的比整理史料的高人一等。如果那观点本身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纵然是花言巧语成堆,其价值也与胡诌没有什么区别,还不如扎实的史料整理对于学术的精进有所贡献。

另一个突出的感想是,如果承认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的范畴,将学生定位为未来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才,那么,对学生进行学术技能的训练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在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中,学术技能训练应该属于“授业”一类。如果在研究生期间仍然将纯粹的知识传授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来实施,则必然疏于学术技能的训练,从而不大可能培养得出将来能够胜任学术研究的人才来。所以,在适当的时候,给出一个有价值的、与学生眼下所达到的知识水平相当的、只要他们自身付出相当的努力就能够做出点儿模样来的题目,放手让学生去做,导师的工作主要放在鼓励和引导上,也就是寓“传道”与“解惑”于“授业”之中。这样,既能让学生在独立操作的学术实践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学术技能训练,又能为学生毕业以后的学术道路提前打好专门的知识基础,还能创作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来。一箭而三雕,不亦说乎?

说是感想不少,可真正值得拿出来与读者共享的不多,谨此打住。

2008年10月9日

巴山夜雨时

目 录

>>> CONTENTS

抗日战争中内迁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图考 / 严彦

绪论 / 2

第一章 中国电影制片厂建筑概述 / 4

第二章 中国电影制片厂建筑图考 / 9

后记 / 39

图片索引 / 41

附录 1938 年 9 月至 1946 年 3 月中制内迁重庆期间大事记 / 43

陪都时期的电影宣传 / 熊学莉

第一章 陪都时期报纸电影广告的种类 / 48

第二章 陪都时期报纸电影广告的表现形式 / 57

第三章 陪都时期报纸电影广告的诉求重点 / 67

第四章 陪都时期报纸电影广告的媒体策略 / 85

第五章 陪都时期电影宣传中的促销手段 / 90

第六章 围绕几部影片上映事件的广告宣传 / 93

第七章 关于苏联影片的广告宣传 / 103

第八章 关于中制、中电出品的广告宣传 / 109

第九章 一则耐人寻味的轶闻 / 112

参考文献 / 115

附录一 1939—1945 年重庆上映电影情况统计表 / 116

附录二 1939—1945 年重庆上映电影目录 / 117

非常时期(1941—1944 年)电影检查所 /张馨艺

绪论 /134

第一章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建立及迁至重庆的背景 /138

第二章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组织规程及检查标准 /141

第三章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工作内容 /146

第四章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检查对象调查分析 /155

第五章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的撤并 /169

结语 /172

参考文献 /173

附录一 电影检查法 /174

附录二 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 /177

附录三 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 /179

附录四 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组织图 /182

好莱坞电影的陪都市场 /王晓倩

绪论 /184

第一章 陪都时期好莱坞电影的放映环境 /187

第二章 陪都时期好莱坞电影的发行放映模式 /192

第三章 陪都时期好莱坞电影的经济保护措施 /204

第四章 陪都时期好莱坞电影的市场路线及意识形态诉求 /210

第五章 陪都时期好莱坞电影的广告宣传 /218

结语 /228

《中国电影》(1941/1—3)研究 /苏韶红

绪论 /230

第一章 《中国电影》的创刊及其编辑理念 /232

第二章 以《中国电影》为中心的抗战电影理论运动 /247

第三章 中国电影的路线之争 /259

结语 /270

参考文献 /272

附录一 《中国电影》一至三期总目录 /274

附录二 《中国电影》订阅价目、广告价目、征稿启事 /278

附录三 1937—1945 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情况 /279

附录四 抗战时期重庆电影期刊、电影副刊一览 /284

抗日战争中内迁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图考

执笔：严彦

第一章 中国电影制片厂建筑概述
第二章 中国电影制片厂建筑图考

绪 论

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最大的电影制作机构,抗战期间于1938年10月从武汉迁至重庆,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中制迁往南京,原厂用地遂闲置。其间曾有航空司令部租用厂地来置放家具,《和平日报》拟设办事处,但原厂建筑几乎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1946年底,“演剧十二队”借住中制厂地,但因中制用地归属不明确,无人看管的状态仍未改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制用地被重庆市话剧团接管,至此,中制的闲置状态结束。20世纪90年代后,重庆市话剧团保留的原中制建筑渐被拆毁。至20世纪末,除防空洞外的原中制所有17处建筑被拆殆尽,房屋荡然无存。虽然1998年在原址上仿原貌修建了“抗建堂”,然而开发速度过快的密集建筑群还是将中制旧址深埋于高楼大厦之下。

2004年10月,笔者为收集论文资料至重庆市话剧团探访,目之所及竟是已面目全非的中制旧址,高层住宅群已将原有格局破坏殆尽,且因建筑过度密集,原有路面或被开挖或被填土,甚至连地势起伏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制旧址踪迹难觅。笔者找寻到目前重庆依然健在的两名原中制员工进行访谈,他们是原中制的布景师万声老先生(89岁)和“业务课”宣传组员工陈兰荪老先生(84岁),他们都在年轻时因战乱来到重庆,战争结束后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在重庆的60多年里,他们亲眼目睹中制的一步步变化直至踪影全无。毫无疑问,他们的记忆和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石曼(78岁)和曹明舒(80岁)等老先生1949年来到重庆市话剧团,他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也目睹了原中制建筑的渐渐消逝。在与这些历史的亲历者多次接触后,笔者撰写论文的过程由最初的探访演变成一次实实在在的地面“考古”活动,而长达5个月的访谈也逐渐使中制这一沉降于历史深渊

里的旧址浮出水面。抢救史料的工作也同步进行着,因为稍微一点的迟疑和疏忽,就会导致不可挽救的结果,如果这些工作不在屈指可数的几位老人仍健在的时候进行,那么永远消逝的将不仅仅是老人们的回忆,更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链环。而令人欣慰的是几位老人仍思维敏捷、头脑清醒,他们对于过往愈发清晰的记忆使得访谈工作颇见成效,抢救史料的工作也因此能顺利进行。本文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录音整理出10万字,图片78幅。文中出现的绝大部分图片为第一次发现或制作,本文中的全部数字资料均未公开出版,部分数据来自重庆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或重庆市文化局出版的内部刊物上,其余来自私人提供或收藏,而全部数字与图片均吻合,实地勘测与丈量的尺寸也大致相当。因中制1946年迁往南京,重庆保存的照片、图册极难寻觅,万声老先生向本文提供了大量图片,而本文大部分手绘图片也均由万声老先生手绘,绘制好的图样已分别送至陈兰荪、石曼、曹明舒等老先生处审阅认可,图例由万声签字。部分图例为万声于1998年绘制,2004年修改完成,同样送至上述各先生处审阅认可。文中图片因论文需要,方向统一制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标准方向相反,实为实际写作中所需如此,方向均在图片中标注清楚。

第一章

中国电影制片厂建筑概述

因受战事影响,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于1938年9月27日正式迁至重庆,同时选址于重庆市观音岩纯阳洞建设新厂。^①纯阳洞因曾有一座供奉吕洞宾的小庙而得名,位置在今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区处于嘉陵江与长江合抱的地带,是重庆市最繁华的区域,而纯阳洞位置在渝中区西部中山一路附近,背靠批把山,周围道路纵横交错,属区内繁华地段,而批把山只是一个小山丘,中制旧址实际上是批把山的山势延伸区(见图1)^②。

以今天的眼光看,纯阳洞地处市区繁华地段,附近山坡耸立,地势起伏大,似不宜建厂,然而当时却另有原因,一是抗战中因搬迁仓促,在草草考察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即把纯阳洞划为军事区域作为中制用地,中制属军事单位,不得违命;二是今日之纯阳洞挖山开路后变化很大,而当时的纯阳洞稍显偏远,虽距离市中心不远,但周围无任何建筑干扰,是一个荒山,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环境清幽,易于躲避日机空袭,虽位于批把山山腹处,但坡上有零星平地可供建房,且中制所处区域山势渐缓,地势起伏并不太大(见图2)。

① 《重庆电影纪事:1905—1992》,重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第1页,内部出版,1995年。

② 本文图片来源有三种:一是从正式出版的书刊中获得;二是由万声手绘;三是私人赠与。其中图1、图8.2属第一种;图8.3、图10.1属第三种;其余皆属第二种。